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研究员)

当今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基辛格称其为“四百年未有之变局”,并非虚言。哈斯的“无极时代”、梅德韦杰夫的“多极化时代”、萨科齐的“相对大国时代”等等说法,虽是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定位“新时代”,但都说明对于时代之变与体系之变,各国都深有体悟并开始全力应对。中国既是体系转型的重要原因,也将受到转型的深度影响,理应更加清醒判断形势,更具战略自觉与战略胆识。

国际体系虽然杂乱,但并非无序,实则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之统称。国际格局乃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多以“一超多强”描述之。“一超多强”者,“一超”为尊,“多强”为用;“一超”多能主导国际事务,“多强”纵有掣肘之意,也难收牵制之效。而且,“多强”均将与“一超”的关系视作重中之重,处理同他国关系往往掂量美方反应。过去十多年美国所以能在中俄、欧俄、中日等大国间左右逢源、纵横捭阖,除实力与影响力如日中天,也在于美看透大国上述心思之故。而如今,“多强”与“一超”的力量对比虽未质变,但布局已然生变,国际格局已显露出“多强一超”特征。“多强一超”与“一超多强”看似简单的次序颠倒,却反映了自“9·11”(恐怖袭击)至“9·15”(华尔街海啸)以来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即,美虽仍为“一超”,但实力与影响力与上世纪90年代巅峰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多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明显上升,美国行事不得不认真考虑“多强”反应;“多强”并敢于公开挑战美之霸权而令美无可奈何,俄强力应对“俄格冲突”、法德公开倡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均为表现。甚至被美贬为“失败”国家的朝鲜、伊朗、委内瑞拉等,也屡屡走边缘,坚守国家利益不为所动。

国际秩序即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大体尊奉或生存其间的各种制度安排、行为准则、理念框范。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欧风美雨东渐,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因素。二战后建立的种种秩序,看似东西方不同制度国家协商的结果,实际上制度、规则、话语

很大程度上也为西方主导。而这一局面目前正在改观。一方面,非西方力量整体提升,使西方世界开始侧目“权势东移”的现实;新兴力量群体走上崛起或复兴之路,则使老牌强国不得不思考主动或被动让渡部分权利。另一方面,既有各种国际制度安排及观念理念在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也日渐不敷所需,亟待调整与变革。事实上,各种改革的细流已在汇聚,金融危机则使其相与为潮。有的改革已初具雏形,如金融危机催生金融秩序改革提前到来。G20峰会一而再、再而三,机制化已成定局,G7/G8地位相形下降。货币格局多元化、贸易结算“本地化”、外汇储备“非美元化”、超主权货币成为热议等,显示美元霸权遭遇历史性挑战。IMF、世界银行改革也已提上日程;联合国改革虽一波三折,但其势难挡。各种区域性政治秩序重组异常活跃;有的后来居上,如气候秩序构建。欧日主导局面正在改观,美、中、印等大国呼吁合作,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很可能成为大国平等协商新的气候变化机制的重要平台;有的则杂乱无章,如国际安全秩序。朝核、伊核危机不见曙光,核不扩散机制岌岌可危,“无核世界”倡议虽应时而起,但大国安全合作前景依然难料。

此外,传统民族国家虽依然是国际政治主体,但非国家行为体愈益活跃,恐怖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体系新的塑造或破坏力量。人口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异、国家结构重组、国际秩序重建,构成当前及未来十年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

国际体系转型带给中国的,更多是机遇。其一,“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使得美国战略重心转向“拼经济、塑形象”,各大国也首次将“求合作、谋发展”视为重中之重,而这正是中国所极力推动的。中国经济实力、独特影响力乃至发展理念,无形中得到放大,话语权必然相形提高。其二,在此乱世,美国霸权地位下沉、俄欧躁动不安、日印难堪大任、发展中国家前景迷惘,中国成

为几乎所有力量借重的对象, 一举一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体系转型的方向, 外交空间明显增大。其三, 发展模式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热点, 中国模式得到更多认同。曾几何时, 中国模式招致西方世界围攻, 但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功实践、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关于发展模式的全球性辩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遭到质疑等, 使中国模式显示出生命力、活力, 开始得到世界多国的认同, 甚至美欧也开始调整思维, 对中国体制包容性加大。这将极大提升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

机遇虽客观存在, 但能否把握得住则有赖战略自省、战略胆识与战略谋划。战略自省意味着清醒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战略胆识意味着关键时期要敢于出手、有所作为, 战略谋划则意味着有所作为必须讲求策略, 即“有所作为, 韬光养晦”。目前, 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已向中国发起“中美共治”之邀, 呼吁构建“两国集团”; 而另一些国家越发警觉中国下一步的走向; 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期待更甚; 中国普通民众则梦想“均富”、“和谐”、统一、和平。凡此不同呼声恰恰反映了今日中国之“多元一体”复杂身份: 既是发展中国家代言人, 又是新兴大国象征, 还是“大国俱乐部”争相吸纳的新成员; 既是 GDP 坐三望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 又是人均 GDP 百位以后、区域发展差距巨大的经济“弱国”; 既是被各种“中国威胁论”极力渲染的军事大国, 又是现代化军事实力与美、俄、日、欧等大国仍有重大差距的国家。如何将多重身份兼容并蓄并在平衡各方需求基础上加以灵巧运用, 是中国谋求应对体系之变的第一步。

中国要想在国际体系转型关头谋求最有利的位, 第二步须“对内施仁政”, 即利用各国忙于自救之机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当前, 各大国都在暗中进行能力竞赛和耐力竞争, 谁第一个走出危机, 谁就将占得先机, 也就更有能力塑造体系。新中国 60 周年立起了尊严, 改革开放 30 年累积了

财富, 接下来, 中国应是在不失尊严前提下继续累积财富并善于运用财富、还富于民的时候了。从国家大战略的高度, 扩大内需、关注民生、加大社会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实质性提升军事实力, 力争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使自身实力再上台阶, 正当其时。

在“多强一超”新格局之下, 中国未来几年的大国外交也将面临新变局。一方面, 从奥巴马上台执政后迅速确立对华战略主轴、高调定位中美关系、倡导建立新机制看, 中美关系正在逐步打破美新政府上台引发颠簸摇摆的“周期律”, 呈现“超”“强”合作的新气象。这一气象自有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不得已加大对华倚重的成分, 但更是中国自身实力增长、中美关系 30 年累积效应的结果。中国须抓住机遇, 继续解放思想、加大投入, 经营中美关系, 力争开创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大国和平共处新篇。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发展更加抢眼, 中国与“多强”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微妙, 竞争性一面会有所突出。越是如此, 中国越需保持发展节奏、把握层次和分寸、讲求外交艺术。简言之, 处理好“多强一超”关系, 是中国积极应对体系之变的第三步。

最后, 中国应以中美日三边关系之推进作为打造“和谐周边”的突破点。一方面, 中美日关系好坏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处境, 而东北亚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薄弱环节, 抓好中美日关系有助于突破周边外交瓶颈; 另一方面, 作为美亚太同盟体系之关键, 美日同盟具有指标性意义, 中美日对话实则意味着中国与美亚太同盟体系对接, 这是走出亚太冷战结构的必由之路; 再则, 东北亚已有美日韩、中美日等三边对话机制, 中美日展开对话也无可厚非。以上海合作组织协调中俄关系、稳定中亚局势, 以“10+1”、“10+3”、“10+6”等机制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稳定东南, 以“六方会谈”+“中美日对话”之配套协调拓展中美日三边关系、稳定东北亚, 理应成为中国多层次、复合型周边战略的应有之义。○